

中共與「歐洲共產主義」

王建勛

一、「歐洲共產主義」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俄在東歐建立多個共黨國家，而一些西歐民主國家的共黨亦隨之壯大，並且都以莫斯科為其領導中心。可是到了一九五〇年代，南斯拉夫共黨已經提出自己通往社會主義的路線，主張民族主義的共產主義，國際共產運動因而開始分化。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後，俄共對東歐的政治支配力量大減，以致對發生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抗暴，祇得強行軍事干預。進入一九六〇年代，中共與阿爾巴尼亞對蘇俄的反抗，更表明了蘇俄對國際共黨的領導權已發生動搖。

一九六八年八月，蘇俄軍事鎮壓捷克，中共斥責蘇俄為「社會帝國主義」和「社會法西斯主義」，並表示堅決支持各國共黨對抗外來的干涉與侵略。捷克事件以後，中共對蘇俄所提出的「有限主權論」，更是猛烈抨擊，意在離間蘇俄與各國共黨的關係。而西歐國家共黨對捷克事件，亦曾紛紛提出抗議，此與各黨對匈牙利事件所採的態度曖昧相比，已大不相同。所以捷克事件實已深深震撼了西歐各國共黨，促使它們開始強調國家主權的重要。

在捷克事件以後，中、俄共對立日益激烈，西歐各國共黨在莫斯科與北平不斷加深的衝突中，都在尋求適合於本國國情的獨立路線，呈現出分化與背離的傾向。但是蘇俄認為其領導地位的動搖，都是中共搞分裂的結果，因而企圖排除中共於國際共黨陣營之外。然而一九六九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共黨大會上，不僅很多西歐共黨不願意批評中共，其中奧地利、瑞士、義大利、西班牙以及英國共黨，反而紛紛對捷克事件表示不滿。

法國和義大利共黨是西歐最大的共黨。它們都是從第二國際民主社會黨演變而來，與蘇俄共同組織第三國際的共黨。可是捷克事件以後，一向以蘇俄馬首是瞻的法共，為要消除法國人民對它所存「蘇俄傀儡」的印象，也逐漸擺出了獨立自主的姿態。義共從一九七二年柏林格 (Enrico Berlingue) 出任總書記後，就主張國際共產運動應該多中心主義化，反對各國共黨事事聽命於

莫斯科。此外，西班牙共黨與俄共關係一向不好，西共總書記卡里由（Santiago Carrillo）譴責蘇俄軍事入侵捷克，雙方裂痕更深。莫斯科曾企圖支持親俄派的利斯特（Anlik Lister）取代卡里由，結果引起一九七〇年西共內部的鬭爭，卡里由驅逐親俄派份子。所以西歐三個主要共黨早已存有疏遠蘇俄的意念。

一九七三年十月，中東第四次戰爭爆發，其所引起的世界能源危機、經濟萎縮，普遍籠罩了西歐國家；而生產停滯，通貨膨脹以及經濟蕭條所引起的大量失業，更助長了社會各階層衝突的激化。法共和義共已在檢討面對資本主義危機，如何適應環境，爭取人民信賴，以利取得政權^①。此後，由於東西方和解的進展，不結盟運動影響力的增加以及阿拉伯石油加價的威脅，國際情勢已有很大變化。蘇俄乃乘機對西歐發動和平攻勢，積極倡導召開「歐洲安全合作會議」，使法共、義共和西共都有感於在建立歐洲和平的目標上，難以置身事外，必須力求適應。

一九七四年一月，在布魯塞爾召開的西歐共黨會議上，義共總書記柏林格曾努力促使西歐共黨團結^②。同年二月，蘇俄放逐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使西歐左派知識份子響起一片抗議之聲。索忍尼辛的見解，明顯的降低了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在西方國家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也使得西歐各國共黨處境更為艱難。所以一九七五年七月，西共與義共舉行了高峯會議，同年十一月法共與義共也舉行了高峯會議，它們都宣佈支持多黨政治，保障民主自由，想藉社會主義民主化來突破所有政治和社會的阻礙^③。

一九七五年間，蘇俄雖然在東西和解以及不結盟運動方面獲有進展，但其與中共之間的惡化情勢並沒有什麼改變，所以莫斯科仍一心想把中共排除於國際共黨陣營之外。然而，西歐各國共黨，除西德共黨外，都不願意公開介入中、俄共鬭爭。它們爲了避免未來的世界共黨大會變成一個反中共的場所，乃倡議先召開包括東西歐共黨在內的「歐洲共黨會議」。在此項會議舉行前的最後一次籌備會議中，西歐共黨不但對於蘇俄所擬加強控制各國共黨及打擊中共的文件，不予贊同，而且還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理論，爭辯不休。它們認爲各國共黨如沒有完全的獨立自主，即沒有真正的國際主義。所以迨至一九七六年六月廿九日，在東柏林正式召開「歐洲共黨會議」的時候，法共、義共和西共幾乎一致的反對蘇俄和東歐共黨國家所強調的總路線^④，迫使蘇俄爲了換取表面上以平等爲基礎的相互合作，以達孤立中共爲目的，而不得不容忍西歐共黨所揭櫫的平等自主原則，並且放棄

註① Fernando Claudin, *L'Eurocommunisme*, Maspéro, Paris, 1977, pp. 7-20.

註② *L'Eurocommunisme,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No. 328, jan. 1978, p. 17.

註③ 一九七五年七月義共和西共以及同年十一月法共和義共高峯會議聯合公報，是代表「歐共主義」之興起。然而因法共和義共、西共之間仍存有分歧，一直到一

九七六年二月法共廿二屆共黨大會，聲明放棄無產階級，始通過接受與義共，西共結盟的政策。

註④ *Problemes Politique et Sociaux*, No. 293, sep. 1976.

「國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而代以「國際主義團結」。蘇俄默認了各個共黨間的地位平等、獨立與自主，就等於是否定了布里茲涅夫曾公開提出的「有限主權論」^⑤。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佛朗哥逝世以後，西班牙已準備恢復大選。已被壓制了四十年之久的西共，如果要以合法方式取得政權，就必須適應國內環境，改變西班牙人民對共黨的印象，以一個新的策略去推行社會主義運動。法共和義共都極力支持西共參加國會議員選舉，所以在選舉前夕（一九七七年三月二日），三黨在馬德里舉行高峯會議，聲明團結一致，維護各個共黨的獨立自主，重申適應新的社會情況，建立自由化的社會主義，並表明承認多元化社會，尊重民主自由，而以和平、合法方式爭取政權^⑥。至此，「歐共主義」的輪廓，已更爲明顯的表現出來。

二、「歐共主義」的矛盾與分歧

一九七七年四月，西班牙共黨成爲合法政黨以後，該黨總書記卡里由即經常批評東歐共產主義有別於歐洲共產主義。他以「歐洲共產主義與國家」(Euro Communism and the State)一書，抨擊俄共式的共產主義^⑦。他特別強調各國共黨有權走不同的社會主義道路，指出蘇俄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工人民主國家，其內部實際上存在着一個獨裁官僚階級。蘇俄就把這種官僚制度強加於東歐國家，這可從蘇俄對捷克的軍事鎮壓完全暴露出來。

卡里由這本書曾引起蘇俄猛烈的攻擊^⑧，使東西歐共黨間的觀點更爲分歧。就西歐共黨而言，其與東歐共黨的最大不同，乃是西歐國家的資本主義與民主自由的社會制度已根深蒂固，共黨要想獲得政權，必須經由民主道路；而東歐共黨則多受蘇俄控制，當然它們仍要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再就蘇俄而言，它並不重視西歐共黨如何決定自己奪權的方法，因爲它知道西歐共黨奪取政權以後，還是要推行共產主義制度，這正好幫助它突破西歐的政治防線；但它最擔心的問題根本，乃是西歐共黨揚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走向獨立自主，是否會影響東歐共黨附庸亦對蘇俄產生離心，造成對蘇俄領導權的挑戰？從這種利害關係來看，歐洲共產主義的特徵還不僅限於表面上所強調的民族與民主的社會主義立場，更重要的是它們與蘇俄關係的破裂究竟會到何種程度。如果說歐共主義並不潛藏着與蘇俄關係破裂的危險，那麼歐共主義即很難表現出一種新的模式，在國際共產運動中亦不能成爲新

註⑤ *The World Today*, "Eurocommunism and the Pan-European Conference" oct. 1976.

註⑥ *L'Humanité* (法共人道報) mar. 5, 1977.

註⑦ Carrillo, *Eurocommunisme et Etat*, Flammarion Paris, 1977, pp. 14-30.

註⑧ *Novoje Vremia*, No. 26-27, Moscow, juln 23, 1977, pp. 9-13.

的一極，到頭來還是要隨着蘇俄的世界戰略來運轉。

一般而言，從一九四七年「國際共黨情報局」(Cominform)成立以後，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原已形成兩極對立，世界各國共黨的戰略均與蘇俄外交政策密相結聯，所以蘇俄在西歐各主要共黨中，早已建立了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的傳統。然而進入一九七〇年代，美俄和平共存的理論，使西歐各國共黨頗感困擾。在爭論中，法共一直堅持東西和解與和平共存，並不適應所有國家的政治與社會情況，尤其不應該阻礙社會主義革命的進行。到了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六年，歐洲各國共黨籌開第二次歐洲共黨會議期間，義共和西共有意打破兩極世界的限制，法共則仍堅持己見，三者對蘇俄世界革命戰略的看法有所不同^⑨。所以在東柏林會議之後，儘管三者都表示要採取獨立自主的路線，但是三者對於如何適應本身的特殊環境？如何從以往兩極世界觀念中調整其與蘇俄的關係？如何在面對資本主義的情況下確立它們社會主義革命的立場？以及如何使它們的對外政策密切合作等問題，都沒有獲得一個共同的結論。而在另一方面，蘇俄為維持其國際共產運動的領導權，仍千方百計的拉攏西歐共黨；法共、義共和西共雖有意脫離蘇俄的領導，但仍或多或少的維持與蘇俄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歐共主義」的矛盾逐漸擴大，其分歧亦愈來愈深。

就法共而言，它在東西和解中，仍無意與資本主義妥協，這亦是法共雖與社會黨聯盟，但終於宣告破裂的主要關鍵。法共雖然反對以蘇俄為領導中心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却又不贊成國際共產運動多元化的發展。它主張在兩極世界對立的情況下，不再以蘇俄為領導中心，而要依照以往「國際共黨情報局」的路線，在所有各個共黨都能平等與團結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⑩。相反的，義共與西共則認為歐共主義應堅持民主是西方社會主義所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以往以兩極世界為中心的國際共產運動已成歷史陳跡，「歐共主義」應該在國際共產運動多元化方面，形成一個以勞工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緊密結合的獨立力量^⑪。

誠然，法共、義共和西共在「歐共主義」的基本觀念上，都有別於蘇俄的社會主義，他們不僅要從聯盟策略上建立廣大的政治與社會力量以過渡到社會主義，並且還要建立一個所謂民主化的社會主義。可是法共總書記馬沙(Georges Marchais)曾一再表明，法共不僅要改變資本主義社會，並且還要從重要企業收歸國營的措施，達到社會主義的目標。在這個理論基礎上，法共即經常強調它是唯一代表勞工階級的黨，而要以勞工工作為社會轉移的主要力量。義共認為勞工階級只是多元化社會中的一部份，不能單以勞工階級作為走向社會主義的主要力量。西共不僅承認多元化社會，尊重民主自由，並且表示可以接受君主共和，勸導

註⑨ *France Nouvelle*, "Les Communistes Français et l'Internationalisme Proletarien," Paris, mar. 28, 1976.

註⑩ 法共政治局委員卡那那(Jean Kanapa)論「法共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France Nouvelle* Paris, mar. 29, 1976).

註⑪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卡里由對記者(*La Stampa*)談話及義共中央委員塞柯(Sergio Segre)在中央委員會之報告(*L'Unita*, oct. 31, 1965)。

勞工不可以激烈的行動反對政府。因而在理論觀點上西共與義共較為接近，與法共相去頗遠。

法共與義、西兩共之間的基本分歧，主要是法共一直相信法國是西歐國家中唯一可以從反對資本主義而走向社會主義的國家。義共和西共則認為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很多，但是必須注意國家的特性，無論從政治的或經濟的理由，西歐國家要建立社會主義，只能從多元化來進行；因此認為「歐共主義」不應採取唯一的教條方式，而應先考量社會中各種不同的因素，採取一個有利於自己的道路。這三個共黨對於國內的政治鬭爭既存有歧見，當然對兩極世界的看法亦就無法一致，這亦就會影響他們的對外政策難以統一。

就「歐洲共同體」而言，西共與義共雖然認為從歷史與經濟制度的觀點看，「歐洲共同體」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可是從西歐走向獨立的過程看，「歐洲共同體」是一個很有效的組織。他們的理由是西歐國家分裂與孤立是很危險的，必須在統合情況下，才能維護國家領土與主權的完整^⑫。所以他們極力贊成從增加「歐洲共同體」的權能，而達成西歐國家政治統合的目的。相反的，法共一直注意爭取民族主義者的選票，更擔心政治與經濟力量不斷增長，且與美國關係密切的西德，終會變成「歐洲共同體」的盟主，把西歐固定成美國的勢力範圍，故而反對「歐洲共同體」任何可能對國家主權的傷害^⑬。

再就「北大西洋公約」而言，義共以同樣的理由，早在十三屆共黨大會中即已表明它支持義大利留在北約。義共認為除非歐洲出現真正的緩和，解除北約與華約的對立，否則歐洲的緩和與合作不僅困難重重，並且亦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程序。在這段期間裏，義共既不能改變現狀，就只能從保衛北大西洋公約來建立民主化的社會主義^⑭。西共反對西班牙加入北約，主要是不想破壞北約與華約的力量均衡，藉使西班牙在兩者之間能够保持中立。但是西共並不反對美國在西班牙境內建立軍事基地，這是因為美國在西班牙建立軍事基地，並不影響西班牙中立。不過西共亦曾明白的表示，美國終有一天要離開西班牙，其條件是當蘇俄撤退在捷克的軍隊，歐洲真正走向緩和之時^⑮。

法共對北約的立場，可以說與義共和西共完全對立，尤其是自一九七七年法共與社會黨關係破裂，即激烈的攻擊北約，認為北約仍是「美帝國主義」作為威脅東歐國家和便於對西歐進行干預的工具，因此它反對法國重回北約軍事組織。很顯然的，三國共黨對北約的立場亦直接關係着它們在兩極世界觀念中對美國的態度。在法共看來，美國好像是一個「世界警察」，美國與西德的緊密關係，已使後者逐漸成爲前者在歐洲的代理^⑯。西共以往亦曾譴責美國與佛朗哥的關係，但是西共對美國一向沒有敵意，

註⑫ 一九七四年一月卡里由在布魯塞爾召開的「西歐共黨大會」中之演說。

註⑬ *L'Eurocommunisme,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No. 328, Jan. 20, 1978, p. 19.

註⑭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柏林格在電視訪問中談話 (*L'Unité*, juin 16, 1976)。

註⑮ 一九七五年七月廿八日卡里由對美國「時代週刊」訪問談話。

註⑯ 法共馬沙在法共廿二屆共黨大會中之演說 (*L'Humanité* Feb. 5, 1976)。

且曾多次聲明不要與任何國家爲敵，尤其是美國^①。西共認爲西班牙建立民主政治更需要美國的援助。義共亦沒有與美國爲敵的企圖，義共認爲在兩極世界中，以美國來維持世界力量的均衡，繼續創造緩和的條件，藉使義大利走向社會主義^②。

總之，法共一直是反對資本主義，所以一九七九年五月法共廿三屆共黨大會決定仍要追隨蘇俄的外交政策。現在法共與社會黨對立，對於明年法國大選，勢必採取一個反資本主義的經濟計劃與反美的外交路線展開競爭。義共不僅仍同意義大利繼續留在北約，並且決定在兩極世界中，既不反美亦不反俄的政策。西共則堅持要從美國和蘇俄之間尋求獨立，主張從歐洲人的歐洲走向社會主義。很明顯的，三黨在兩極世界中的立場，義共和西共相差不多，法共則無疑是對「歐共主義」一大打擊。

當前的問題是，最近義共極力拉攏法國社會黨、西德社會民主黨，以開創西歐左派大聯盟，共同支持北大西洋公約，這更觸怒了法共。迨蘇俄出兵阿富汗，引起了東西關係的緊張，法共乃不可避免的要支持蘇俄的立場，而背離了「歐共主義」。

三、中共對「歐共主義」的基本態度

長久以來，在中共與俄共的鬭爭中，西歐國家共黨幾乎都站在蘇俄一邊，使中共與西歐共黨的關係愈加疏遠。自世界能源危機以後，西歐各國隨着通貨膨脹與失業而來的社會動盪，一時造成各國共黨聲勢日壯。中共的態度和美國一樣，是唯恐西歐共黨得勢，乃極力拉攏西歐各國保守派勢力，呼籲他們力挽狂瀾。一向是歐洲最保守的葡萄牙，在一九七四年九月，經由青年軍人發動政變，而使葡萄牙共黨進入政府。中共當時曾表現得焦慮不安，且不斷提醒西歐各國政府應重視蘇俄對南歐的入侵，必然會影響到西歐的安全。一九七五年六月，義大利地方選舉結果，義共較以往更爲躍進^③，中共乃開始批評義共是修正主義，「新華社」且警告義大利的基督教民主黨不得讓義共參加政府。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西共總書記卡里由，在批判親俄派共黨份子之後，初次率團訪問北平，但是他並沒有獲得毛澤東的接見。中共領導階層對他的冷淡，使卡里由深感意外。這便足以說明中共對西歐國家共黨的態度，自始卽沒有把它們是否接受蘇俄的理論作爲唯一的標準。迨至「歐共主義」興起，它不僅對馬列主義作了重大修正，對俄共權威地位構成一大挑戰，而且有意在國際共產運動多元化發展中，調整與各個共黨的關係；可是在中共的眼裏，仍認爲「歐共主義」是走蘇俄路線的修正主義。

註①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四日西共執委會公告報 (Le Monde juin 16, 1976)。

註② *Expresso*, Rome, No. 21, 23, May, 1976.

註③ 義大利在這次選舉中，繼續執政多年的基督教民主黨後退，所得票數僅佔全部選票三五·四%。而義共則比一九七二年大選時增加二百萬票，佔全部選票的三三·四%，和基民黨比較僅差一·九%。

中共把「歐共主義」看成是蘇俄故意放鬆對西歐共黨的控制，有意幫助西歐共黨遷就西歐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以便早日奪取政權。

在中共看來，「歐共主義」雖有別於蘇俄式的共產主義，但亦不同於中共式的共產主義。所以在開始時，中共除了譴責蘇俄是「社會帝國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元兇，很少談論西歐共黨與蘇俄的關係。中共不僅對日共聲明放棄「無產階級專政」不作反應，也儘量不報導有關「歐共主義」的消息。例如中共曾對羅馬尼亞總統希奧塞古(Ceausescu)要求廢除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對國家主權的限制，作了詳細的報導，但對法共總書記馬沙所提俄共的理論不是國際共產運動的「試金石」的說法，却隻字不提。從中共這種宣傳手法，不難看出其動機：那就是法共雖然批評俄共，但並沒有反抗蘇俄，而且法共經常對「毛澤東主義」不滿，法共對俄共的批評，並不等於要接受中共的理論^②。其次，一九七六年六月在東柏林召開的「歐洲共黨會議」，業已顯示國際共產運動起了很大變化，但是中共仍極力保持緘默，不作評論，因為中共認為儘管歐洲共黨已開始分化，但在基本上，「歐共主義」的政策並不符合中共的政治路線。

從一九六一年俄共廿二屆共黨大會以來，法共一直在黑魯曉夫的理論上反對中共。一九六四年五月，法共召開十七屆共黨大會。馬沙曾在會中公開譴責中共領導階層是「冒險主義」、「教條主義」，亦是危害國際共產運動的「分裂主義」^③。一九七五年五月，鄧小平訪問法國，他在巴黎對記者表示中共贊成歐洲共同市場的立場，全力支持西歐團結對抗超級大國霸權，亦曾引起馬沙的公開抨擊，說鄧小平是希望把歐洲變成一個由托拉斯壟斷集團侵略和統治的歐洲。一九七六年三月及四月，西班牙共黨總書記卡里由及法共總書記馬沙，先後應日本共黨主席宮本顯治邀請訪問東京。他們都曾公開聲明堅持每個共黨的獨立自主，同時聲明放棄一九一七年列寧用以支持十月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表示要在民主與自由的程序中，打開共黨執政的道路。雖然法共馬沙和日共宮本顯治在共同聲明中，重申社會主義聯合、反對帝國主義，決定致力於和平、裁軍、全面限制核武器和解除軍事集團的對抗，只是沒有提到中共與蘇俄的關係。可是馬沙在東京一項記者招待會中，却猛烈的抨擊了中共的政策，他說：中共極端反對蘇俄並譴責所有和平與緩和的發展，支持資本主義軍事擴張，終將會帶來一場大災難。他又表示中共主張美國加強與西歐的關係，已違背了西歐國家人民的利益。所以他希望中共領導階層修改毛澤東的路線，否則中共即永遠無法獲得穩固^④。當一九七六年五月，毛澤東死亡之時，法共中央委員會在其弔唁電文中特別表示法共與中共具有相同的社會主義路線，暗示有意乘機改善雙方的關係，但是中共對此未予理會。此時法共已把兩黨衝突的責任推向中共，認為法共與中共關係惡化，不是社會主義理論

註② *Le Monde* juin 29, 1976.

註③ *Est & Ouest* 1-15 oct. 1976.

註④ 同註②。

的問題，而是國際關係的問題。法共的此項指責，引起了中共對「歐共主義」的抨擊。一九七七年六月九日，中共「人民日報」以「動口與動手」為題，發表一篇文章，批評歐共主義的議會主義、和平演進是失敗主義，並強調中共所主張的共黨武裝鬥爭的重要性。該文除引述毛澤東在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一九五七年）強烈指責黑魯曉夫有關和平過渡主張的言論外，並進而批評西歐共黨要從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理論是極大的錯誤。所以它認為武裝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普遍的規律，爲了達到革命的勝利，決不能單純依靠動口（合法鬥爭），而必須準備動手（武裝鬥爭）。

事實上，中共與西歐共黨之間的障礙，主要還是後者與蘇俄的關係。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八日，鄧小平在接見法新社記者強調聯合世界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共同反對蘇俄霸權的時候，表示不希望法共、義共和西共參加政府，因爲他不認為這些共黨是馬列主義共黨；不過他希望西歐共黨能在行動上證明它們已真正脫離蘇俄而獨立。再者，中共露骨的批評「歐共主義」，主要的還是中共認為西歐共黨仍是接連於蘇俄的修正主義。中共指出歷史上很多失敗的例子，如智利、葡萄牙以及印尼共黨都是在和平過渡錯誤路線上遭遇失敗，所以它勸告西歐共黨必須記取那些血的教訓，不要爲了迷戀新老修正主義而反對武裝鬥爭。

何以中共認為「歐共主義」沒有真正脫離與蘇俄的關係？這可從中共對西共總書記卡里由的批評獲得答案。

(一)中共雖然同意卡里由對蘇俄社會現象的批評，但是認爲他批評的不够徹底。中共認爲蘇俄已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卡里由雖然認爲蘇俄工人沒有政治權利，勞工變成被統治階級，但是他否認蘇俄統治階層是一個剝削階級。中共所強調的是蘇俄新資產階級統治者，正運用黨和國家的領導權，透過國家機器的控制而掌握了生產資料及達到剝削蘇俄人民的目的。蘇俄的新資產階級，在極端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上，已經人格化，亦即是按照官階權力大小來分配從蘇俄人民身上所獲得的剩餘價值及從世界各地掠奪而來的財富。所以中共認爲卡里由沒有從蘇俄生產關係來分析蘇俄已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是有意避重就輕，無意與蘇俄完全脫離關係^②。

(二)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當卡里由接受記者訪問時，他曾表示要放棄列寧主義，只保留馬克斯主義。中共批評的更爲厲害，認爲卡里由所強調的馬克斯主義並不是什麼新的東西，而是列寧早已批臭了的恩斯坦、考斯基老牌的修正主義及黑魯曉夫、布里茲涅夫現在所鼓勵的修正主義三種路線的總和而已。所以中共認爲卡里由批評蘇俄，主要是爲了反對列寧主義，以致他把當前蘇俄所出現的法西斯主義統治歸咎爲列寧主義的產物。

在這種情況下，當中共爲了「四個現代化」，有意向西歐國家尋求科技與武器之際，立刻遭到西歐共黨強烈的反對。它們唯恐西歐各國向中共提供科技武器會被蘇俄視爲反俄行動，而造成歐洲情勢的緊張。中共則堅持其一貫立場，認爲走蘇俄修正主義路線的歐共主義不會完全脫離蘇俄，因爲蘇俄爲了在歐洲爭奪霸權以及防制「歐共主義」引起東歐共黨走向獨立，必然要對「歐

註②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香港「大公報」。

共主義」的發展加以限制，並且最後仍要把「歐共主義」變成蘇俄所實行的「社會帝國主義」。

四、中共與「歐共主義」關係的轉變

自蘇俄出兵阿富汗以來，國際情勢發生很大變化。在歐洲方面，美國要加強西歐盟國的團結，以共同抵制蘇俄；而蘇俄亦儘可能的發動宣傳攻勢，指責美國要在西歐佈置新的戰略武器，已威脅到歐洲的安全與世界和平。蘇俄爲了要迫使西歐國家保持與美國的距離，一方面企圖透過歐洲共黨的支持，製造聲勢，以對西歐國家施加壓力；另一方面亦要破壞「歐共主義」陣容的團結，即使不能使其聽命於莫斯科，亦要把法共重新拉回蘇俄的懷抱。因此，在蘇俄幕後指使下，就有法共和波蘭勞工黨共同出面發起於一九八〇年四月廿四日在巴黎召開「歐洲共黨會議」之舉。

在此項會議召開之前，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以及英國、荷蘭、冰島、瑞典、義大利、西班牙等國共黨均表示不參加，因爲它們都曾經反對蘇俄出兵阿富汗。義共和西共更把這次會議看成是一種騙局，懷疑蘇俄企圖使西歐共黨捲入華約與西歐對立的立場，重新聽命於莫斯科。於是義西兩共的拒絕參加此項會議，可以再度表明它們拒絕蘇俄對國際共黨的領導權，亦可再次證明它們遠離蘇俄的立場。最近中共與義共建立了正式關係，便是在這種情況下促成的。

中共從一九七五年以後，由反對美俄兩個超級大國霸權，變爲把蘇俄列爲主要敵人，並聯合世界上所有可以聯合的力量共同對抗蘇俄。所以自一九七七年以後，中共已逐漸改變對修正主義的敵對態度，開始注意到各國共黨與蘇俄的實質關係。到了一九七九年春季，中共駐義大利僑使參加了義共五十屆共黨大會，十月義共青年代表團訪問北平。特別是義共譴責蘇俄出兵阿富汗以後，中共對義共的態度表現得更爲親切。這時，中共已邀請義共總書記柏林格到北平訪問，並且開始改善西共、英共、比共及瑞典共黨之關係。相反的，由於法共贊同蘇俄出兵阿富汗，致使其與中共的關係已經完全斷絕。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四日，柏林格率領義共代表團到北平訪問，主要關鍵在於中共已不再批評修正主義，正如同中共不再視南斯拉夫爲修正主義，而與其改善關係一樣。可是這並不表示中共與西歐共黨間所有的基本分歧已經消除。起碼「歐共主義」放棄「無產階級專政」，而要從議會鬪爭走向社會主義，與中共所強調的馬列主義基本路線，仍是無法相容的。只是中共有意暫時擱置理論的爭執，以免阻礙其與西歐共黨關係正常化的發展。例如一九七九年二月，姬鵬飛招待義大利共黨青年代表團時，即已表示中共要擺脫所有理論上的分歧，來尋求改善彼此的關係。

誠然，中共要改善與西歐共黨的關係，完全是基於其本身對外政策的需要，至少在反對蘇俄霸權以及越南問題方面，中共與西歐共黨還沒有一致的立場。現在中共要從歐洲的實際情況來觀察「歐共主義」，不僅不再譴責「歐共主義」放棄「無產階級專

政」，不再指其爲修正主義，反而有意默認「歐共主義」的歷史背景和政治立場，其目的即是希望西歐各國共黨都能够在國家主義的獨立路線上，脫離蘇俄的影響，進而共同反對蘇俄的霸權。所以中共要改善其與西歐各國共黨的關係，並不是中共在本質上有何改變，而是中共在反對蘇俄方面，愈來愈不擇手段。

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柏林格訪問中國大陸勢必受到中共領導階層的熱烈歡迎。可是柏林格却處處表示其訪問的意義，主要在恢復兩黨正常關係，增加彼此了解，共同合作，但並沒有針對第三者的用意。在雙方的對外談話中也可以看出它們在這方面的分歧。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對義大利記者表示，中共非常樂意同世界上一切獨立自主、堅持正確立場的工人階級政黨建立、恢復和發展關係。但是他強調堅決反對某些打着共產黨招牌，實際欺負別的黨、干涉別國內政，甚至出兵侵略別國領土的所謂共產黨（意指蘇俄）。他說：如果不同這些黨劃清界線，並同它們進行堅決鬭爭，即無法維護國際共產運動的尊嚴，即不能有效的動員全世界工人階級和人民同那些霸權主義者和破壞世界和平的人進行鬭爭。在另一方面，柏林格雖然對蘇俄入侵阿富汗持批評指責的立場，但並不同意把蘇俄說成是一個敵人。他在四月廿二日的記者招待會中即曾明白的表示，義共不想把蘇俄說成是一個敵人，亦不想把中共說成是一個敵人。他又以當前的國際緊張情勢及大戰的可能性，作爲西共拒絕與蘇俄敵對、不同意中共以國際統戰反對蘇俄霸權以及反對中共攻打越南的理由。所以他說：現在國際情勢是愈加惡化，而義共所擔負的主要任務是爲了世界的安全，穩固與和平而奮鬥。

很明顯的，「戰爭的可能性」曾是中、義共雙方所最關心的中心問題。柏林格有意要勸使中共降低與蘇俄可能的衝突，並曾以此作爲他這次訪問北平的任務之一。在柏林格而言，即使在目前匪俄力量不均衡情況下，中共不可能與蘇俄妥協，但至少中共可以維持與蘇俄關係的現狀，不要再繼續惡化下去。所以義共與中共建立關係，更顯示義共有意在有利於國際共黨關係緩和的基礎上，以國家主義重建新的國際共產運動。柏林格在北京大學演說中，即曾強調各個共黨的相互尊重與獨立自主是爭取擺脫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不可缺少的基礎。所以他特別呼籲社會主義必須容納不同的路線，在各自獨立的情況下，重建國際共產運動的信心。無疑的，柏林格已試圖對中共提供一個新的社會主義模式，希望中共不再堅持以往的爭論，接受社會主義陣營中存在國家主義的觀念，而能共同從一個新的國際共產運動，促使蘇俄真正的放棄以往對國際共黨的領導權，使新的國際共產運動能够多元化發展。

（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十四日脫稿）